

气候致贫：一个粤北山村的迁徙史

全球进入哥本哈根时间。人们眺望着这座童话城市,政治家们正在那里为彼此国家的碳排放量数字讨价还价。此前,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的政府内阁分别潜入海底和爬上珠峰开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警示世界关注气候变化。可是对生活在远离海洋和冰川的都市人来说,现代化生活条件足以抗衡之,乃至几乎感觉不到。

这时,万里之外的广东阳山县三根村,因为干旱缺水等原因,从1965年开始的分解式迁徙还在继续,至今已经历3代人。这个同样悲怆的故事告诉世人,气候变化真的在影响、并可能最终威胁人类,而贫困地区是其中的最大受害者。

三根村:只剩下两户人家

广州向北150公里即进入阳山县粤北石灰岩山区。这里石多土少、坑多水少、人多地少,土壤保水能力差,农民靠天吃饭。阳山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仍是广东省16个重点扶贫开发县之一。县城往东30公里就是江英镇荣岗村三根村民小组。

三根村只剩两户人家。在12月4日这个初冬的干燥下午,一个55岁、名叫黄什的农民的到来,给这里增添了一点生气。

他穿过一条缓慢上升、2公里长的机耕道,地势豁然开朗,面前是一条宽阔的山间平地。他又走了2公里长的小路,穿过一个村庄,这里的农民也大多下迁了,几个老人在木薯地里和晒场上劳作。再往里走一点,钻过一个石砌门洞,就是三根村。该村三面皆山,只有这条小路可以进出。村里一片死寂,由黄色夯土墙和黑瓦搭建的屋子,有的上了锁,有的敞开房门,里面空荡荡的,有的已经颓败。一条黑狗、两条黄狗奔跑着前来迎接,那是留守户黄老九家的。他去山里采药了,13岁的儿子在镇初中读书,只有女主人孔水兰在家。

另一家留守户是73岁的黄陈和第三个儿子黄水北——他今年40岁,腿部残疾,单身。父子俩相依为命,拿出唯一可以待客的花生,泡茶时才发现没有茶叶,孔水兰就从自己家里带来茶叶。这两户也给人相依为命的感觉。

“祖宗搬来这里时头上都留着辮子(清朝),至今已经12代人。”黄陈坐在床沿回顾村庄历史。这里曾经人丁兴旺,还是荣岗村委所在地,但因干旱少水,交通不便,上世纪50年代村委会就下迁了。1965年,吃水和灌溉问题更紧张,三根村开始了第一次分解式迁徙,往外迁出的村民分别组成塘三村和围脚村。外迁户在三根仍有少许土地,每到耕种、收获季节,他们和后代都要返回三根劳作。黄什就是10岁那年随父亲下迁的,父亲去世后,他能在三根还有2亩旱地,水稻是早就不能种了。

2005年起,三根村开始了第二次大迁徙,22户走了20户。村里的资源不再紧张,但土地依旧干旱。黄什这天下午进村时,一路都是枯草,地里的辣椒还没长大就枯死了。花生已经收获,但今年雨水更少,不仅收成下降,颗粒也不如往年饱满。

独自在家的孔水兰挑着两个水桶去村外挑水。这里虽在山区,但多是石头,山半腰以下长了些不茂密的树木,山里常见的小溪在这里并无踪影,春夏季节一下大雨,雨水从山头一路倾泻,三根村顿成汪洋,但大雨过后,水很快就消失在地缝里。全村人的饮用水源都在村外一个近10米深的岩洞里,一条狭窄陡峭的石板小路通下去,可见一汪岩石渗出的泉水。孔水兰很快就担起两桶水,晃悠悠回家,这是她打发时间的好办法,因为现在只有2户人,所以可以很从容地喝水、洗衣,还可以去浇大白菜。



三根村外迁户的后代,部分搬到了附近的白沙村,租住在当地农户家里。而他们的子女都不愿意在漂泊流离的“代耕农”环境里生活。

太阳快要下山了,黄什开始回自己的家。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出现在小路上,正是黄老九在镇初中读书的儿子。他说,和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都搬到山下去了,他觉得很孤独。他问父母什么时候也搬走,他们的答复是“家里穷,没法搬,以后再说吧”。这样,他不得不寄宿在学校,每个周末回家都要走两个多小时。

塘三村:生活并没有好多少

黄什也想搬,但同样因为穷而作罢。

回到塘三村,黄什又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包烟丝,开始吸卷烟。塘三村已由1965年建村时的8户繁衍到21户,黄什也从10岁小孩变成一个55岁老人。

为了不挤占稀缺的平地,这个村子的风格很像城市里早年的工人平房,两排长长的房屋之间是石板铺成的道路兼公共活动空间,老人们坐在那里抽烟,眯着眼似睡非睡;放学回来的孩子在上面跳橡皮筋。每户人住得都一样小,还不及三根村,但这里可以种一季水稻,调节了以往只能吃番薯、玉米羹的单调。
 一条水泥公路2年前通了进来,荣岗村委会就在100米外,附近有村完小、小卖部、医务所,但这里仍是石灰岩山区,海拔仍有600多米,村民照样靠天吃饭,生活没有比三根村好多少。更糟糕的是,近些年来,田地里的水也越来越少。

来自阳山县气象局的数字是,1957年—1997年,全县年平均气温变化平稳,1998年起到现在明显升高,年平均最高温和最低温都在近10年明显偏高。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显增多,且有逐年增多趋势,高温热害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像三根、塘三这样处在石灰岩山区的村庄,高温带来的后果就是水的蒸发量加大。

阳山近几年旱灾不断。往年年平均降水量在1800mm左右,但2004年只有1160mm,发生严重秋冬连旱。2007年7月连续30多天滴雨不下,今年降水量也仅有约1300mm,让江英镇的7个小水电损失惨重。镇人大主席梁带财说,这些小水电是镇财政主要收入来源,每年有两三百万元,镇政府办公、工作人员福利和山村公路的修路费都靠这个。往年雨水充沛时,水库能蓄水1000多万立方,还不敢多蓄,怕洪水突发。今年因干旱仅蓄水500万立方,镇财政收入锐减。三根、塘三村附近就有水源,而更高处、更偏远的一些村庄,村民甚至要走1个多小时担水喝。对此,今年起,镇政府对走路20分钟以上担水的村庄实行引水工程,在山顶有泉水的地方建蓄水池,然后铺设长长的水管通到村庄。

在黄什看来,冬天越来越暖和,

干旱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喝水要去村后的蓄水池里挑,但农田几乎完全看天气行事,引水渠早已荒芜废弃。每年春天,要等到一场雨水之后才开始插秧,不再像以前那样等节气了,否则秧苗很可能枯死在田里。

由于处在高寒山区,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1986年起,当地政府开始在塘三村下面的大桥村试种反季节蔬菜,销往珠三角地区。现在,它已占到阳山农民收入的一半。荣岗村也种了1000多亩,但近些年干旱不断,致使反季节蔬菜歉收,而且病虫害增加。黄什现在只种一些辣椒给自己吃。气候变暖给阳山带来的不仅是干旱,还有洪涝灾害。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阳山年降水日数呈减少趋势,但降水强度增大,暴雨导致灾害发生的概率增大。1957年—1993年,一般一年只出现一次洪涝灾害,但1993年后,有12年共发生26次,有5年每年发生三四次洪涝灾害。

此外,冷灾、雹灾、风灾、泥石流等灾害的频率也在增大,尤其是去年初的冰灾更给当地林业和山区群众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县政府已在今年8月宣布,开始对商品林和生态公益林实行3年和8年的封育。

黄什回到家中,继续讲述村庄的迁徙史。他叼着卷烟,掰着手指,“一,二,三,……八,从2005年起,有8户又从塘三搬去了清远,还剩13户。”他的两个儿子也去了佛山打工,把孙子留给他带。“我也想下山的,可是太穷了,搬家费就要1000多元。”他指了指左脚被车祸造成的残疾,“下山也干不了重活,留下来的,都是像我这样的穷人。”村民外迁,村完小从前几年的3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

长时间呆在村里的年轻人只有25岁的村医黄志文。卫校毕业后,他 在外打工,可是薪水太微薄,他又回到村里。除了骑着摩托车出诊,他几乎没有同龄人可以交谈。他说:“尤其是晚上,时间最难打发。这里连女孩子都没有,过几年我也可能离开这里。”

在外漂泊的心酸

2005年,47岁的黄水景率领一家大小4口人离开塘三。他们把家里的1头猪、1头牛都卖了,用了多年的黑白电视机也卖了15元。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他们来到了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塘基村委会水美寮村民小组,一个叫松仔岭的缓坡上。这次一共来了15户,其中三根村9户、塘三村5户、围脚村1户,全是当年三根村外迁户的后代,全姓黄,彼此间沾亲带故。他们填了水塘,推平荒坡,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村庄。

从1993年开始,在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阳山县开始对石灰岩山区群众实施移民工程,至今已多达近6万人,其中县内安置了4万多人,县

外(主要是清新县、清城区和花都)安置了近2万人。在阳山县城的环城移民新村,就居住了11个乡镇的6800人。这些都是计划内移民,而黄水景等人则是自发性移民,他们不享受政府的补贴。

在松仔岭上,早有几十户阳山的同乡,早于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形成了一片整齐的砖瓦房小区。他们租当地农民的土地耕种,称为“代耕农”,更多的人则去当地的小工厂打工。黄文景等人与水美寮村民小组签了合同,以4.6万元的价格,租赁6.5亩荒地用来搭建住房和养猪棚,时效是20年。黄文景用不多的积蓄买来4万多块红砖准备建房,还租了对面远处一亩水田,这里不缺水,每亩能比老家的收成多收50公斤。

就在他们建房过程中,当地政府以“违法建筑”为由,把房屋推倒。众人便用砖块和石棉瓦搭起窝棚,一住就是3年,直到被政府的推土机再次推倒。一些老人和妇女坐在屋内不出来,被强行抬出。村里没有把钱退还他们,他们就搬到了附近的白沙村,租住在当地农户家里。15户里仅有5户还在租地种,其他人都是去铜丝厂打工,每天工作9小时,把铜丝从一卷卷的废电线里抽出来,每天薪水是30多元。

在外漂泊的心酸,他们很少对外人提及,只有在摄影师的镜头面前,在黄昏的斜阳里,他们站在出租屋的大门前,或者脚踏松仔岭下尚存的房屋废墟时,都莫不神情肃穆。

如果把黄水景比作三根村的第二代移民,那么,现在又出现了第三代移民。他的儿子和女儿都不愿意在“代耕农”的环境里生活,去了佛山打工。黄陈的孙子黄什明在松仔岭的窝棚里住了1年后,也去了花都石岭镇一家手袋厂,收入并不比在石角的铜丝厂多很多。20岁的他说他受不了那里的脏。他已经3年没有回到三根村,除了爷爷,他几乎不想念家乡。

消除气候贫困最困难

“气候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加剧贫困。”今年6月,绿色和平和乐施会在北京公布一份《气候变化与贫困》报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称,这是他所见到的首次在全国乃至全球所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与减少贫困的案例分析。

此前,致力于气候变化研究的气象学家,在上述两家NGO组织下奔赴3个贫困县:西北干旱区的甘肃靖县、西南喀斯特地貌区的四川马边县和广东石灰岩山区阳山县,发现气候变化正在影响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用水条件、房屋设施、牲畜养殖等基本生活生计,造成了外出移民和返贫等后果。

广东省气象局区域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首席专家杜尧东博士,在考

察阳山县后认为,“阳山气候变化表现为气温上升,降水集中,降水日数减少,强度大,由此引发了频繁和严重的水旱灾害,结果使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进一步的破坏,有可能给贫困问题的解决增加难度,甚至会 使部分脱贫人口返贫。”

“中国的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带高度相关。”《气候变化与贫困》报告指出,在生态敏感地带人口中,74%生活在贫困县内,约占总人口的81%,贫困人口分布与生态环境脆弱区地理空间分布高度一致性。而贫困地区正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区。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异常气候频繁大面积发生,自然灾害、环境灾害更为多发,不断地冲击正常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未来发展最大的限制因素。我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仅2008年的南方雪灾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00亿元,同年我国全年自然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1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9%。

而从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6500起与气候相关的灾害。预计到2015年,全球气候危机影响的人数将增长54%,即达到3.75亿人。

胡鞍钢认为,一直以来,人们只关注减少收入方面的贫困,而忽视了其他的贫困,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生态贫困和气候贫困人口。“从中国30年的减贫实践来看,减少收入贫困人口相对容易,而消除气候贫困人口是最复杂、最困难的。”

气候变化专家、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而达教授表示,“造成当前致贫原因较过去进一步复杂化,地区差异大的原因很多,但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他说,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在多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部分沿边地区,这些地区致贫返贫的原因大不相同,而贫困发生率大都超过40%。

胡鞍钢说,气候贫困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它的识别和统计比较困难。目前没有任何明确的、可量化的指标来评价气候贫困人口。不仅中国如此,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统计体系都没有反映气候贫困的规模大小、地理分布、贫困特征。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晓毅认为,在原有的扶贫政策中,未能充分考虑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地方性、更分散决策和有广泛公众参与的扶贫决策。

从今年起,阳山县又启动了新一轮移民的步伐,共有516个自然村的3.38万人符合搬迁条件,其中2.3万人自愿要求搬迁。

中国已经宣布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量将比2005年减少40%—45%。但对三根村这样脆弱的村庄已经等不及了。它排放的温室气体远远少于城市,却是受影响最深的,而且村民的后代乐意去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城市生活。这也许就是生活的残酷。

(据《南方都市报》)

